

# 中国多边合作体系 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 在东亚的矛盾与兼容

祁怀高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与中国主张的多边合作体系在东亚并存，东亚国际体系呈现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这两种体系本质上是对立与矛盾的，但在现实中谁也无法取代对方。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东亚这两种国际体系将在矛盾中磨合与兼容，推动东亚局势朝着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

## 一、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兼容的理论解读

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关系的背后是多边主义与双边联盟的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东亚的共存现象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须从理论角度予以解读。

多边主义是多边合作和多边外交的核心，是建立正常稳定的国际体系的必要前提。从总体上来说，多边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战略性多边主义”，从国际关系的主体——主权国家的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理念、指导思想和政策工具，指的是一个国家更倾向于在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或国际组织中进行磋商、协调，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通常与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理念相对立。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把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画上等号。二是“制度性多边主义”，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说，多边主义意味着一种有关国际秩序的组织原

则，是“基于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之上用来协调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sup>[1]</sup> 是一种“概念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构，它决定着各种人群之间（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和权力关系”。<sup>[2]</sup> 多边合作和多边外交通常被认为是三个以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常设或特设的全球或地区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中的互动，开展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多边合作和多边外交既可以从个体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单位层次）理解，也可以从国际互动方式角度（体系层次）来理解。

联盟是国家对付威胁，求取安全，增强权力，维护或扩展利益的常用方式。著名国际法学家格劳秀斯说，“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强大到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不需要他国帮助的地步。无论是为了贸易的目的，还是为了抵御其他国家军队的进犯，即便是最强大的民族和君主也要寻求同他国结盟”。<sup>[3]</sup> 这可以解释冷战后的美国即使处于超强地位，也还是需要盟友和推行联盟战略。冷战后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双边联盟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联盟，成为一种“威权式联盟”。“威权式联盟”概念最初由泰德·霍普提出，他认为，新现实主义者只把联盟当作权力的增强器，只将联盟的起源归结为威胁的存在，恰恰忽视了联盟作用于国际政治的其他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忽视便是没有意识到联盟也能变成制度化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内，权威、意识

形态及联盟领导国的制度得以“复制”。霍普将这种“权威共同体”称作“威权式联盟”，认为这种联盟即使在导致其产生的威胁消失后，仍能持久存在。<sup>[4]</sup>“威权式联盟”与其他联盟形式有很大不同：一是其力量分配上突出的非对称性。美国作为单一霸权和体系内的超强国，成为这一联盟的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者，这将直接对联盟内部的决策体制形成刚性制约；二是基于一定权威和不对称力量而建立的联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这将使联盟具有较长的持久性，比较不易瓦解；三是这种联盟具有很大的扩展性或扩张性。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多边主义与双边同盟的关系多持悲观态度。现实主义学派对同盟采取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认为同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一种“牵连”和“抛弃”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盟国必须在联盟内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和联盟义务的明确承诺，否则其他联盟伙伴可能会寻求别的安全安排而将其抛弃；另一方面联盟成员如果急于证明它对联盟的忠诚而积极地承担联盟的义务，那又可能使它很容易地被拖入一场它并不希望卷入的冲突或战争。同时，现实主义对多边主义持否定态度，认为多边安排对国家影响力非常有限，很难取得成效，这在现实主义对集体安全的论述中表现格外明显。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虽然对同盟和多边合作都予以肯定，但也多认为二者是很难相容的。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理论渊源——集体行动理论的观点，“小集团”行为是导致集体行动失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多边框架中的双边同盟会导致多边主义的终结。然而，目前东亚体系结构现状却是双边同盟与多边主义共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相互兼容，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这是因为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既存在竞争的一面，也存在共通的一面。二者竞争的一面表现为：第一，在认为多边合作具有联合起来反对或制衡双边同盟的情况下，主导双边同盟的霸权会坚决地对多边合作的形成和发展予以压制。因为，主导双边同盟的霸权会尽可能排斥对手的出现，因此对任何可能威胁或影响到其地位和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非常敏感。对主导双边同盟的霸权来说，无

论多边合作发展到什么阶段，只要是潜在的或明确的反对或制衡其霸权地位，则意味着对其核心利益的严峻挑战。霸权国会采取一切可行办法对这种倾向、势头或状态进行打击。第二，当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路径与霸权国的战略取向或偏好不一致甚至相左的情况出现时，霸权往往采取反对、抵制等消极行为。或者，当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将挑战霸权的地区秩序安排时，霸权将采取激烈的措施反对并力图扼杀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势头。上述情况在霸权认为具有重要或关键利益的地区尤其容易出现，东亚地区就是美国认为攸关其霸权地位的关键地区。

同时，双边同盟与多边合作也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多边合作对霸权主导的双边同盟来说是中性的。霸权对地区多边合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反对、听之任之所产生的收益与成本计算。这里可以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加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与企业类似是一个组织，其用以分析企业的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国家和国际社会。<sup>[5]</sup>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进交易成本概念而把社会、政治规则以及政治制度结构内生性。<sup>[6]</sup>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框架内，即要对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参与和国际体系对国家的影响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国家对多边机制的参与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当收益大于成本时，霸权的多边合作政策是积极的，反之则消极，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听之任之的态度，随势头发展再做打算。因此，霸权可以在下面情况中对多边合作产生积极行为。第一，当多边合作的发展符合霸权的战略取向和偏好，或者多边合作对霸权的战略取向和偏好并不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时候，霸权更容易采取支持的行为。反之，则从积极行为转向。第二，当支持地区多边合作获得更大收益，或反对多边合作没有收益并有损于这些地区的国家与其关系时，或者，对地区多边合作听之任之将削弱甚至丧失其对该地区的影响进而影响其霸权威望时，霸权国家会对多边合作持一种积极行为，或从反对的立场转向。第三，霸权在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能力，但霸权也同时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当地区

多边合作成为一种难以阻挡的趋势时，霸权国家将顺势而为，对地区多边合作的政策与态度趋于积极。

由此可见，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存在复杂的关系。双方竞争的一面需要磨合，双方共通的一面提供了兼容合作的空间。从总体上来看，双边同盟和多边合作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但是这种张力是可控的，在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东亚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等方面，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和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兼容合作空间的。

## 二、美国对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固守和优化

二战以来，美国为了构筑遏制社会主义的亚洲防线，采取了与西欧体系不同的战略，先后通过与日韩等国签订一系列双边条约，建立了其主导下的双边同盟体系。这种同盟体系也被形象地称为“轮毂—轮辐”体系，即美国充当轮毂（轮轴），而其他五对双边关系（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中的每一对都是轮辐。

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把双边同盟体系作为其亚太政策的基石。但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出现了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勃兴，这种发展趋势显然对“中心和轮辐”体系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美国的应对策略基本上可以分为“固守”和“优化”两种。所谓“固守”，就是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兵力不变，来继续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并通过加强双边军事同盟体系来防止其在该地区盟友的离心倾向。所谓“优化”，就是通过软硬两手将该地区最主要的新兴力量——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同时通过升级跨越太平洋的亚太经合组织防止该地区出现封闭尤其是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主义倾向。而美国的这些努力从总体上说是奏效的。

### （一）美日同盟关系的强化

美日同盟是美国主导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加固和

强化美日同盟，采取了三大战略举措：一是大力增强美在日本的军事攻防力量。美国除在日本保留部署 5 万兵力和 20 多艘战舰外，还将其极少在海外部署的最新式武器如宙斯盾战舰、战略核潜艇、无人驾驶战略轰炸机、“全球鹰”侦察机以至首艘核动力航空母舰进驻日本基地。二是加强美日军事一体化。美国除与日本联合研制、开发、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激光反导武器，把日本完全拉进美国的全球反导体系外，还与日本组建联合指挥部，以便把日本更紧密地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轨道。三是扩大美日安保范围。美日安保条约起初规定美日安保同盟专注日本本土防御，现在两国安保联盟的防御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甚至把台海地区纳入其“共同战略关切”范围，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这表明美日安保同盟从防御性趋向进攻性。<sup>[7]</sup>

对美国来说，保持和强化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日本是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国，日本的合作和支持对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发挥主导作用极其重要。同时，通过美日同盟，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获得日本的合作和后勤支持。冷战以后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中，比如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日本的配合作用就非常重要而突出。其次，美日同盟也是美国牵制日本、防止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一个手段。日本军国主义的再现将引发东亚进入地缘权力斗争和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美国干预成本的提高。因此，放弃美日同盟而让位于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和力量均势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再次，美日同盟既有利于美国保持与中国接触，也有利于在必要时制衡和防范中国。布什政府就一直认为，一个强大的、参与地区事务的日本对美国在东亚的三种重要战略利益至关重要：抗衡正在崛起的中国、为美国军队提供更大的后勤和情报支持、协助美国向潜在的麻烦地点部署军队。<sup>[8]</sup>

未来的美日同盟仍会继续保持和加强，但美日两国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演变对同盟关系做适当调整，努力和平化解双方的矛盾和分歧，在尽可能同时满足各方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同盟向着联系内在

化、目标外向化、地位均衡化、职能全球化的方向发展,<sup>[9]</sup> 这将对未来东亚国际体系带来复杂的影响。

### (二) 美韩同盟关系的调整

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韩同盟是美国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重要支柱。冷战后,为了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和应对新的挑战,美韩两国对美韩同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义。重新定义后的美韩同盟,突出的是驻韩美军的功能由专守防卫韩国扩展到防守整个东北亚,但并不是将美韩同盟的功能扩展到东北亚。通过对驻韩美军的缩减和重新部署,驻韩美军的“绊网”功能将大大下降,韩国将不得不直接承担更大的防御北方的责任,美军则主要承担后续反攻责任,美军在是否介入朝鲜半岛冲突问题上将享有更大的灵活性;驻韩美军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的防卫,而将突破朝鲜半岛范畴,覆盖整个东北亚,成为地地道道的东北亚军,其遏制对象也不再仅仅是朝鲜,还包括周边的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崛起的其他大国。因此,即使朝鲜对地区安全的“威胁”消失,美国仍会从维护霸权的视角出发继续保持美韩同盟。为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会为保持美韩同盟去寻找各种合法性,就像它在维持北约和美日同盟中所作的那样。

当前,美韩同盟的发展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美国仍在努力支撑美韩同盟并试图按自己的理想对美韩同盟进行改造。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由于韩国自主性的增强以及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出现新的变化,美国在利用美韩同盟来实现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时,开始遭遇越来越大的困难和阻力。

### (三) 美国重返东南亚

相对于东北亚,东南亚对美国的战略意义似乎不那么大。以界定“美国国家利益”而闻名的美国学者唐纳德·纽霍特兰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议尼克松政府不要把东南亚地区视为关键利益所在。<sup>[10]</sup>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应对中国的崛起,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的主旋律,东盟国家甚至被搁置到美国对外政策的边缘。“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反恐战争为其重返东南

亚提供了契机。布什政府调整了对这一地区的政策,改善或提升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再次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重要环节。目前,美国以推进与泰国、菲律宾两个盟国的战略合作为中心,以向东盟国家提供反恐和救灾援助、同其进行联合反恐和救灾及举行联合军演为手段,大力扩展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与影响。

冷战后美国在东亚双边同盟的存续完全依赖于美国当今的超强力量,由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和挑战。美国在东亚威权式联盟内部出现重重危机,面临潜在的两难境地:一是体现于单元层面,即作为盟主的美国其所采用的以单边主义方式追求自身安全赢余甚至是绝对安全的目标,与其联盟战略所谋求的所有成员国安全的目标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二是体现于更宏大的体系层面,即美国是准备构建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全球体系,还是孤独而偏执地追求主宰世界的地位,两种选择关系到美国主导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的前途,也事关世界体系的走向。

冷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同盟体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强化。在近期,美国依然会把双边同盟作为其亚太政策的基石,以维系地区主导权;但从长远看,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的演变取决于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程度。在美国的东亚体系构想中,中国是最大的潜在对手,遏制和包围中国是美国经营这一同盟体系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还有维护与促进地区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防止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护海上通道安全、应对地区减灾等多重目标,这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也为两种东亚体系合作预留了空间。

## 三、中国在东亚地区积极提倡 多边合作体系

在冷战之后尤其是新世纪的东亚,另一个由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在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基础上的多边合作体系正在逐步构建,并深刻影响东亚国际体系的和平转型。这种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目前主

要由围绕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次区域合作体系构成。

### （一）东南亚多边合作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东南亚合作战略可以归结为“经济多边主义优先,安全多边主义其次”。中国在东盟“10+3”框架内着力发展同东盟的“10+1”合作,努力在“次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官方关系始于1991年,当时中国成为东盟的协商伙伴并加入东盟外长扩大会议。1996年,中国升格为东盟的完全对话伙伴。在1997年举行了首届中国—东盟非正式首脑会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定期化、制度化的新的协商机制。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与东盟关系从对话合作转向制度性合作。如果说,中国过去常常对东盟推动多边主义的努力进行回应,那么现在,中国已显得越来越主动,有时为促进中国—东盟合作的制度化而提出自己的倡议。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正式同意在十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中国第一次致力于同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实现了中国与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性突破。2002年11月,在金边举行的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全面启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互信迈上了新的台阶。200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作为第一个东南亚区域外大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中国与东盟相互奉行睦邻友好政策。2004年11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全面规划了今后5年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标志着双方关系更加全面、系统、规范和务实。2007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一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签署了《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新加坡宣言》,中国与东盟合作进入新的领域。

到目前为止,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顺利,但也存在制约因素。这主要是南中国海争端;东盟自身一体化整合不顺影响到中国东盟合作的机制化程度;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疑虑未全消,使之采取“两面下注”甚至“多面下注”,拉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来平衡中国的影响。<sup>[11]</sup> 这些问题对双方的深入合作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消减其负作用,促进双方关系的顺利发展,中国在未来推进东南亚的多边合作中要继续深化双方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使相互依存向更宽广的领域拓展,使之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稳定器;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及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适时更新对于双方关系的战略定位,同时根据这种定位来更好地发展双方关系;逐步将双方关系纳入到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区域层面上,培育和塑造区域认同,共同协力构建东亚多边合作体系。更重要的是,中国要加强同东盟成员国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密切与深化同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和全方位的互利合作关系,这是中国推进东南亚多边合作体系,进而推进东亚多边合作体系的基础。

### （二）东北亚安全多边合作体系的构建

中国的东亚多边外交另一个主要努力方向是在东北亚。当前,东北亚地区正面临某种历史性变局。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大体具备四大特征:一是“冷战加热战”,即冷战的遗迹尚未清理,热战的阴影又开始笼罩;二是“历史加现实”,即历史的包袱尚未甩掉,现实的矛盾又开始激化;三是“传统加非传统”,即传统的安全问题尚未解决,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已开始凸显;四是“经济加政治”,即经济一体化势头最被看好,政治关系的疙瘩却“剪不断理还乱”。<sup>[12]</sup> 这表明东北亚地区存在明显的安全困境,朝核问题就是典型例子,朝核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安全困境。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所体现的建立多边合作安全机制是解决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出路所在。

中国为了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力主把多边主义和建立多边安全机制应用于朝鲜半岛的冲突解决中。2002年10月,朝鲜核危机再度爆发,东北亚地区安全出现紧张态势。美、朝在运用“多边”方

式,还是“双边”方式解决朝核问题上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僵持。2003年4月,美国从其多边谈判的要求上让步,朝鲜则从坚持双边谈判的立场上让步,双方的妥协形成了三方会谈。中国为打破美朝核僵局采取某种介于双边和多边外交之间的方式,最终促成了中、朝、美三方会谈并于2003年8月,进一步促成了包括中、美、朝、韩、日、俄在内的第一轮六方会谈,从而展开了真正的多边会谈。2005年7月举行的第四轮六方会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各方通过共同声明,确定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最终目标,美朝双方都做出了自己的承诺。2007年10月3日,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这一“路线图”式的积极成果使得六方会谈进程实实在在地迈上了新台阶。中国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扮演了促进者和协调者的关键角色。这同它传统上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低调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国的推动下,通过六方会谈,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和走向和平与稳定的历史趋势难以逆转。<sup>[13]</sup>

六方会谈是东北亚各方经过长期艰难努力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也是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模式。六方会谈的意义已超出解决朝核问题本身,对于东北亚安全环境建设也有重要作用,有可能进而演化成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中国还努力促进东南亚和东北亚多边合作机制的对接,这就是在着力发展东盟“10+1”的基础上,积极推动“10+3”合作。1997年12月,首次东盟各国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吉隆坡举行,由此开始了东亚区域“10+3”多边合作机制,并在此框架下举行中、日、韩分别与东盟(3个“10+1”)以及中、日、韩三国首脑的定期会晤。经过十多年的发展,“10+3”合作机制由经济领域向社会、经济、文化、安全领域扩展,构建起以经济为动力的多层次、多交叉的全面合作格局,形成日趋成熟的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并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基础。2005年12月,东盟“10+3”的机制演变成更为正式、更高层次、更具开放性的东亚峰会。到2007年底,东亚峰会已经召开

三次会议,成员扩大为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16国。作为东亚各国以及区域外相关国家的合作新平台,东亚峰会标志着东亚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推动东亚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水平迈进。

在中国的参与和推动下,东亚区域合作加速推进。东盟、东盟与各对话伙伴(“10+1”)、“10+3”、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并存,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国关于东亚多边合作的主张和立场也逐渐成形:开放包容,尊重多样,以“10+1”为基础,以“10+3”为主渠道,以东亚峰会为重要战略论坛,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中国在东南亚和东北亚推行地区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的方式有所不同。在东南亚推行多边主义时,中国采取“经济优先,安全其次”的方法,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经济融合,是推进多边合作的主要驱动力。在东北亚推行多边外交时,中国则采取了新功能主义的方式,即从安全方面的多边主义这一高级政治领域起步,在成员国之间培育出了足够的善意和信任之后,再将多边主义引向经济和其他功能性合作领域。不过,无论在东南亚还是在东北亚,中国都把深化经济合作作为地区多边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体现了冷战后地区多边主义的新动力:仅仅依靠以防范威胁和应对敌手为核心的安全方面的理由并不足以维持多边主义。<sup>[14]</sup>

总之,冷战后中国改变了过去对多边主义和地区合作的消极态度与被动姿态,正在越来越鲜明地以多边外交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角色行事。中国的多边外交弘扬合作安全精神,取代冷战以来一直延续的权力政治老式观点和双边结盟的陈旧方式。中国多边外交对美国及其东亚联盟体系具有明显的冲击效果。中国主张的多边合作体系同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形成“多边对单边、多极对单极、经贸手段对军事手段”等两种体系观念之争。

#### 四、两种体系模式在东亚的对接

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和中国主张的多边合作体系存在着一种张力。二者的张力关系表现为:

东亚多边合作的增强对美国的东亚战略和利益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另一方面，两种体系又存在一定的共通性，二者具有可以融合的利益空间。

冷战后中国主张的东亚多边合作的深入和自主性的增强对美国带来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表现为：第一，在经济领域，东亚多边合作的增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使得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这将减少东亚对美国的依赖。同时，东亚区域合作架构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形成真正的三足鼎立之势，将与欧盟一样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导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第二，在安全领域，东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对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和双边同盟构成挑战。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曾在东亚地区内部的国家间起了离间作用，使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密切于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东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密切了内部国家间的关系，逐渐扭转了美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密切程度甚于东亚内部国家之间关系的局面。同时，从长远看，由于安全合作的深入，东亚国家之间互信增强，地区内部中小国家对大国的威胁感不断下降，它们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也随之减弱。

在一定时期内，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和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共通性。第一，在经济领域，东亚地区的发展与繁荣是两种体系互利共赢的利益所在。美国是东亚所有经济体的重要伙伴。东亚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37%—38%，美国在东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其总量的比重也为15%—18%，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广泛的经济利益。同时，双方在经济上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各有所需：东亚地区需要美国的市场、技术和参与国际经济管理的经验；美国需要东亚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和资金回流。在美国与东亚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二者正在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第二，在安全领域，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是两种体系追求的目标。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背景、边界纠纷、资源竞争、海上安全、民族主义、政治社会体制的差异和多元文化、多种族存在等诸多原因，东亚地区内部各国的政治安全关系发展得

并不顺畅，导致各国互不信任并影响了深度合作的空间，使得相互经济关系一度成了安全的“人质”。没有政治安全合作的东亚容易成为军备竞赛的一个主要场所，从而形成螺旋式循环，影响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如果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加剧、安全环境恶化，这对区域内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美国已经深深卷入东亚事务，在东亚地区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东亚安全形势恶化将损害美国利益。因此，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是美国追求的战略目标与政策取向。不同的情况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主要通过建立国家间的互信和多边合作机制来实现地区安全稳定的目标；而美国则通过双边同盟战略以及美国本身的军事安全战略调整来维护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局面。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对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既有挑战性的一面，又有共通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二者既有摩擦的一面，也有兼容的一面。在相当长时期内，两种体系模式要实现“摩擦中兼容”即磨合的目标，就必须找到对接点。对接点的建立需要美国和东亚国家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需要中美两国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对美国而言，建立两种体系的对接点需要美国放弃抵制东亚多边合作体系的政策。近年来，美国意识到东亚多边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东亚多边合作机制开始有限支持和介入。在1995年的《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中，美国表现了对在亚太地区探索和发展新的多边安全机制的兴趣。认为多边合作作为补充美国安全同盟和前沿军事存在的一种手段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通过地区安全对话能够确保后冷战时期不会重启地区角逐、混乱和军备竞赛的大门。<sup>[15]</sup>“9·11”事件以后，小布什政府加强了与东亚各国在反恐事务上的合作，并借助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两个平台推行美国的全球反恐计划。但美国认为，冷战后地区层次的多边合作是有限的和实用性的。多边合作对美国的双边同盟只是一种支持或补充但不是一种替代，多边合作必须从属于双边同盟。这是其有限支持和容忍多边主义的一个前提条件。美国还希望把东亚地区的安全政治合作囊括在整个亚太

区域,以有利于它将其在东亚地区的安全需要与经济利益及美国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结合起来。因此,美国对东亚多边合作机制的有限容忍和支持归根结底是为其亚太战略与霸权利益服务。但形势比人强。随着东亚的加速崛起和多边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美国通过双边同盟主导东亚事务越发困难,它对于东亚多边合作机制的宽容与支持将趋于增多。从未来的角度看,虽然美国的东亚战略中仍以双边同盟为核心,但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多边主义对双边主义的有效补充将越来越重要与增强。

对中国而言,建立两种体系的对接点需要坚持东亚多边合作的开放性,并努力建立两种体系之间的联系机制。目前,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主导的东亚同盟体系在不断的调整中仍然得以持续,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东亚国际体系。而中国参与推动的东盟“10+3”、东北亚六方会谈这两个次区域合作机制起步于世纪之交的后冷战时期,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发展瓶颈,成熟度和内聚力不及美国主导的东亚东盟体系。而且美国对中国一直保持警惕,担心中国正在“精心构筑亚洲版门罗主义”要将美国“挤出东亚”。中国如以多边合作体系取代或者排斥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有可能导致中美的直接对抗,从而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现实做法是,坚持东亚多边合作的开放性,在照顾历史、尊重现实、着眼未来的思想指导下,加强多边机制、大国作用和美国存在的良性互动,逐步建立稳定、高效并具备亚洲特色的地区体系。另外,中国要积极探求建立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与双边同盟体系之间的联系机制。可考虑参照东盟地区论坛的对话伙伴国模式建立东亚峰会与美国的对话伙伴机制,和参照东盟“10+3”、东盟“10+1”的模式,建立东亚与欧盟关系机制,甚至可考虑直接建立东亚峰会+美国机制。这些方式都值得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去探索。

总之,东亚多边合作并不必然排斥美国或损害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的利益,或者说,东亚多边合作体系与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并不必然会构成一种对立的关系,从而导致后者的被削弱或被瓦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方具有一定的共赢空间。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主张的多边合作体系和美国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在谁也无法取代对方的情况下,现实的做法是在磨合中兼容。美国要放弃抵制东亚多边合作体系的政策,中国也要坚持东亚多边合作的开放性。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经济贸易到政治安全的基本思路是构建东亚多边机制的必由之路。两种体系融合形成的一种混合型秩序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也是东亚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重要保证。

注 释:

[1] John G.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John G. Ruggie ed.,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1.

[2] Keith Krause & W. Andy Knights, eds., *State, Society and UN System: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7.

[3] 转引自[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4] Ted Hopf, "Post-Cold War Allies: The Illusion of Unipolarity", in Barry Rubin and Thomas A. Keaney, eds., *US Allies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p. 19.

[5] 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

[6] 恩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吴经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页。

[7] 尹承德:《美国亚太战略新态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第2页。

[8] Alan Dupont, *The Schizophrenic Super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5, p. 47.

[9] 王鐸思、倪峰、余万里主编:《美国在东亚的作用:观点·政策及影响》,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10] Frank C. Darling, *United State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Permanency and Change*, *Asian Survey*, Vol. 14, No. 7 (July, 1974), p. 608.

[11] 王玉主:《中国东盟关系中的相互依赖与战略塑造》,载《国际问题论坛》,2008年秋季号,第65页。

[1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地区安全政策及安全合作构想》,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13] 《新共识、新步伐——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谈第三轮六方会谈》,新华网2004年6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06/26/content\_1548744.htm.

[14] 王建伟:《中国多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演变》,载潘忠岐主编:《多边治理与国际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1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1995*, February, 1995.